

## 【一】

## 美國傳教士在福州

麥利和史跡評述

◎朱峰

清末的中國，正逢「千古未有之奇變」。1840年，列強的堅船利炮逐步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中西關係由此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五口通商，福建地區是中西接觸的前沿；西力東漸，閩地成為首當其衝的地區之一。在絡繹來閩的西方人中，基督教傳教士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宗教群體。與商人、外交官不同，這些傳教士是打著為國人傳福音，為上帝拯救靈魂的旗號來到福建的。福建的基督教傳教史研究，唐日安先生（Mr. Ryan Dunch）的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一書是近來研究力作。但是，這些著作偏向於整體性的描述，缺乏對個別事件或個別人物深入細緻的研究。事實上，清末福建基督教傳教史中，一些外國傳教士是這場運動的最初推動者和主要組織者；他們的活動言行與近代福建基督教的發展及社會的變遷息息相關。從他們的活動經歷可以剖析整個傳教運動的發展軌跡以及與近代福建社會各方面間的互動關係，

因而對傳教士的個案研究應該是構築近代福建基督教史的重要基礎。

在清末來閩的外國傳教士中，在福建傳教 21 年的美以美會傳教士麥利和是一位典型代表。麥利和，英文名 Robert Samuel Maclay，也有一些文獻將其名翻譯為：麥和、麥利加、馬克來等。麥利和 1824 年 2 月 7 日出生於 Franklin County, Pa.，他的曾祖父是愛爾蘭人，1734 年移民來美國賓西法尼亞州。1845 年，麥利和畢業於 Dickson College，隨後即成為美以美會神職人員，負責當地教區的工作。1847 年 10 月，麥利和受美以美會差遣，乘 Paul Jones 號船前往中國。1848 年 4 月，麥利和到達福州。時年麥氏 26 歲。

## 一、麥利和在福建的主要傳教活動

麥利和是抱著強烈的拯救個人靈魂的願望來到福建的。他聲稱：「在中國有四億多人口！他們是誰？我們的兄弟，與我們一樣的血肉之軀。他們是什麼樣的人呢？是異教徒！他們生活在錯誤的漫漫黑夜中，沒有見到一絲真理的亮光……他們是上帝創造的，卻陷入墮落，毀滅，無助的深淵。」<sup>1</sup>「對正在毀滅中的千百萬中國人的同情應當促使教會採取迅速的行動。我們確信中國所需要的更多是基於精神和道德上需要，而非物質

<sup>1</sup> R. S. Malc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with Characteristic sketches and incidents of missionary operations and prospects in China*, (New York: Carlton & porter, 1861), p.19.

匱乏的要求。」<sup>2</sup>正是這份傳教的熱情，麥利和參與、領導了福建美以美會創立、初步發展的全過程。除了 1859 年末到 1861 年 9 月期間一度回美國度假外，麥氏在福建活動了 21 年，足跡遍及福州、延平、莆田、仙遊等地區。歸納起來，麥氏的佈道活動可以分成 2 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麥利和 1848 年與喜穀 (Hickok) 夫婦一同來閩傳教開始，直至 1859 年秋麥利和回美國度假為止。這是麥利和在福建佈道活動的草創階段。正如美國史學家柯文 (Cohen, Paul) 所說：「評價新教早期成就的真正標準，不在於它收到了多少信徒，而在於它為後來的工作所奠定的基礎。」<sup>3</sup>在 1857 年陳安（永高）受洗入教前 9 年中，麥利和沒有找到一個中國信徒。他的精力大部分投入到學習福州方言，尋找住所，建立教堂，嘗試性傳教等方面。麥利和自己也說：「在異教的土地上工作的基督教傳教士，有大量的被稱為世俗事務的工作。如果傳教士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傳播福音的工作中，那麼無論在理論上或是實踐中，在異教地區傳教的工作將大大簡化。但實際工作並非如此，外國傳教士的責任是紛繁複雜的。」<sup>4</sup>

尋找住處、購置房產是麥利和到達福州後面臨的第一個問題。福州闢為通商口岸之初，中國政府並未賦予外國人在此購買或永租土地的權利，還極力反對外國傳教士入城居住。初來

R. S. Malc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with Characteristic sketches and incidents of missionary operations and prospects in China*, (New York: Carlton & porter, 1861). p.249.  
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頁 604。

<sup>3</sup> R. S. Malc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p.158.

乍到的麥利和與擔任福州美以美會監督的喜穀一起在城外南台天安山暫租了一片土地。他們用 800 美元蓋了座有遊廊的簡易平房，屬於木製結構，只有一層。麥利和負責監造，他說：「在那時，差會尚不清楚福州地方當局對待傳教士的具體態度與政策，更不清楚可以在此待多久；而且在福州的氣候條件下應該蓋什麼樣的住房，差會也不甚清楚。」<sup>5</sup> 1850 年，應麥利和所請，美國差會方面特意派遣斯普瑞（Henritla Sperry）小姐來華和他結婚，一起傳道。欣喜之餘的麥利和特意趕往香港迎接未和他結婚，一起傳道。欣喜之餘的麥利和特意趕往香港迎接未婚妻。同年 8 月 14 日，麥利和夫婦一起回福州傳教。麥利和夫人希望興辦女子教育，麥利和在天安山個人住宅附近用 55 美元蓋了幢長 22 英尺、寬 18 英尺的簡易校舍。<sup>6</sup> 此時，麥利和等美以美會傳教士在天安山、中州島西南角上建立了三處房宅，基本上可以滿足傳教士生活、傳教的需要。

據 1851 年 4 月 22 日，福建巡撫徐繼畲在奏摺上說：「花旗夷人在城外南台居住者九人，皆係教士，又瑞國教士一人，共計十人。花旗、瑞國夷人，均屬馴良安靜。」<sup>7</sup> 1851 年 2 月，原先繼喜穀牧師任福州美以美會監督一職的柯林牧師因病離開福州回國，監督一職由麥利和接任，負責總攬福建地區的美以美會。同年 7 月 9 日，高禮（James Colder）牧師夫婦和傳教醫生懷禮（J.W Wiley）夫婦等 4 人來到福州傳教。他們的到來使原有住房不敷使用，住宅房產問題再次出現。為此，麥利和與福州地方政府進行了長達 4 年之久的糾紛談判。1855 年，

<sup>5</sup> Ibid., p. 170.

<sup>6</sup> Ibid., p. 30.

<sup>7</sup> 《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 4)(中華書局)，頁 125-126。

駐福州英國領事得到政府公文，許可外國人永久租借、保有不動產。當年，麥利和就向福州當地居民以永久租借的方式購置了地產。下文是 1855 年的一份購地合同。<sup>8</sup>

立契人 Tieu Nang，于道光二十八年買得宅地乙處。坐落鏡山麓天安鋪。西至 W. S. Sloan 先生之房宅，東以天安寺牆為界，包括河堤下宅地，南以本宅地之舊牆為界，北至麥利和先生的房宅。本宅地界至分明。現情甘將其永租與美國教師麥利和等人，以供伊等在此建房居住。今日收得地價六百美元整。

所有宅地上各物，俱付麥利和先生等人處置。其上果樹亦由伊意去留。價銀收訖後，麥利和勿庸另付錢款。原主亦不得有籍端覬覦，妄生枝節等情。倘有不明或重張典租他人等情弊，他人若來滋擾，係由原主抵當，不涉麥利和先生之事。

今欲有憑，立永租約三份為照

原主 Tieu Nang

在見林 Sah-Huah

咸豐五年二月

和大部分早期來華傳教士一樣，麥利和採取的是直接佈道的方式，即建立街頭小禮拜堂，在街頭分發宗教宣教品等。麥利和初到福州不久，因為在天安山上的住所離福州城太遠，為方便傳道，就在城內洋頭一帶租賃中國人戴成章的鼓店作佈道所。<sup>9</sup> 這個街頭小禮拜堂成了麥利和傳教的據點。麥利和說：

<sup>8</sup> 原文是英文，作者套用清代福建地契合約的格式譯成中文。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p.159.

<sup>9</sup> 林顯芳編，《福州美以美會年會史》頁 130。

我們只能將就著使用這個佈道所。福州的佈道所通常是一間低矮、狹窄、陰暗的中國式房子。這類住所極少清刷、油漆，也缺乏通風採光設備。我們設法在這類房子中和許多人接觸。一般而言，這裏的人們喜歡聽傳教士的演講。雖然如此，他們卻像許多常去做禮拜的美國教徒一樣，喜歡聽簡短的講道。在講道的一個小時內，通常會有兩批、三批的聽眾。每批聽眾一般只待 15 到 20 分鐘，這成了人們的習慣。因為聽眾多數是社會上的勞動階層。雖然他們願意聽我們的講道，但迫於生計不能待得太久。在我們操著不地道的榕腔佈道時，有這麼多人湧進佈道所。這是件好事，我們能夠向大眾作短時間的宣講。<sup>10</sup>

除了在洋頭口佈道所的講道，麥利和還在福州城內四處巡遊傳道，主要工作是向民衆分派宗教宣教品。當時，美以美會傳教士初到福建，「以語言之格不相入，雖強聒不舍，而人終掩耳不聞，於是改其方針，以小冊聖經，及淺顯之教理與實用掩耳不聞，於是改其方針，以小冊聖經，及淺顯之教理與實用科學書，沿途分贈於人。」「欲藉文字引以至於道也。原夫教會初到，國人未明傳教之宗旨，未免懷疑而生謗毀，示以書籍，以代口說。所以破其疑團引其皈依也。且人於素不經見之書，誰肯出金錢而購之者？今舉以贈之，使其受不費之惠，安知無一二感激而悟道者。」<sup>11</sup> 麥利和街頭贈書的對象多是市井民衆、行伍士兵等一般民衆。據麥利和自己的報告，上街時

<sup>10</sup>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p.261.

<sup>11</sup> 林顯芳編，《福州美以美會年會史》頁 207。

常被好奇的民衆圍觀，一些福州天主教徒甚至把他當作外國神父。不過，「一般說來，人們並沒有給這項困難的工作再添什麼麻煩。他們非常渴望建能夠得到我們的書。這時常讓我感到為難。不過，我通常能夠把書送給我想送的人，而同時拒絕其他人的請求。」<sup>12</sup>

事實上，許多求書者只是想看看外國人奇特的相貌，甚至是想從他手中拿點紙張。1854 年 12 月 29 日，麥利和在傳教日記上寫到：

今天，進福州城分送書籍。很奇怪，我居然能夠輕易走過城內的街巷，把書送給那些看來能識字的人們。不過，我依舊非常小心。為防止被好奇的人群圍觀衝撞，我繞過喧鬧的街道，選擇最僻靜的街區贈書傳道。偶爾路過人群擁擠的地方，我就雇轎子快速避過。這樣，我一天內送出了 200 多本福音書、約 300 餘冊的〈登山寶訓〉。有一群男孩，因為我不願意把書送給他們，就跟在我後面大喊大叫。我立即拐進附近的一個店鋪。我告訴店主：作為這一地方的民戶，如果在此出了什麼麻煩，官府將要他負全部責任。店主馬上理解了我的意思，他要店裏一個老夥計出面解決。這位老人家非常憤怒地（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朝那群孩子臭罵一通。孩子們為這突然的變故驚呆了。街上的事態很快平息下來。<sup>13</sup>

儘管作出大量努力，麥利和的傳道工作似乎並沒有收到多

<sup>12</sup>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pp. 258-259.

<sup>13</sup> Ibid., pp. 263-264.

大的成效。麥利和領導下的福州美以美會飽受疾病、內部矛盾的困擾。因為不適應福州的生活環境，許多傳教士都感染上疾病被迫回國，甚至病死在福州；另外，懷特、高禮等人也因與麥利和意見不合先後離開了福州美以美會。福州美以美會的傳教工作一度陷入停頓的狀態。1853年，美國佈道會總部在年度報告中寫道：

對於中國的傳道會，我們實在無法愉快地報告這一差會的情形。那裏的傳教事業正飽受疾病、死亡以及其他不利因素的影響，這種不利影響是在華的其他差會所難以想像的」「正當差會的發展舉步維艱之際，起義者的革命運動（太平天國運動）也在威脅著這座城市。麥利和夫人和高禮夫人的健康狀況惡化，他們的丈夫認為有必要先退到香港休養。懷特已經差會同意，攜妻子返國以恢復她的健康。在福州，只剩下懷禮醫生及其家人。可遺憾的是，上次懷禮先生在信中也說自己的身體狀況不佳。<sup>14</sup>

1854年，懷禮一家終於離開了福州。從1854年1月16日到1855年6月18日之間，福建美以美會只剩下剛從香港回來的麥利和一人，許多人對福州的傳道都失去了信心。「時佈道部以在華傳教，久未著效，議將遠移。」<sup>15</sup>「英商某君與麥利和先生言：攻中國城池易，攻中國人心難。勿庸傳道，束裝回

<sup>14</sup> Walter Lacy, *A Hundred Years of China Methodism*, pp. 47-48.

15 林顯芳編，《福州美以美會年會史》頁3。

16 同上註，頁 129。

國，或舍此圖他，改換地點，方有結實，不然必歸無實。」<sup>16</sup>  
然而，麥利和不改初衷，「自言我竭心力，上帝必給厚資。」<sup>17</sup>  
從 1854 年到 1855 年初，他孤身一人堅持到佈道所傳道，上街  
贈書，開辦主日學，獨力維持著美以美會在整個東亞的唯一立  
足點的工作。

1855年是麥利和、美以美會在福建傳教工作的轉捩點。由於太平軍起義，福州成為中國茶葉的重要出口港。同年，麥利和致信佈道部，稱駐福州的英國領事麥華陀（W.H. Medhurst）已從當地官員處獲准以永租權的形式購置地產。多年來困擾教會的地產問題基本解決。而佈道部也加強了傳教力量。1855年後，萬為（Wentworth），基順（Gibson），保靈（Baldwin）等人來閩協助麥利和工作。由於取得永租權，麥利和決定建立正式教堂，使傳教活動正規化。恰巧在1855年，麥利和在洋頭口的佈道所被火災焚毀，借此機會，他請求原佈道所附近的居民許彥士將茶亭附近的一塊空地也永租於教會，意欲建造正式的教堂。該教堂耗資2,500美元。1855年底破土動工。1856年8月3日，教堂建成，行獻堂禮，名曰「真神堂」。這是美以美會在東亞第一所教堂，也是福建最早的新教教堂之一。當時，「福州知府曾向美國領事施壓，力阻美以美會在交通要道上修建這所教堂。阻撓失敗後，又試圖讓教會在教堂前面掛上『茶莊』的招牌。一位官員催促他們將放在屋頂鐘樓上的大鐘收進樓內，以免讓人看見。」<sup>18</sup>麥利和拒絕了這些要求，「這座建築

17 同上註，頁3。

<sup>18</sup> Ell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p.57.

的建立開創了教會史的新紀元。這件事向中國人證明，我們將永久留在福州。我們相信神的福音將戰勝這座城市的一切反對勢力。官府散佈的關於我們不能和福州人民和睦相處多久的謠言很快就會不攻自破。」<sup>19</sup>

同年，麥利和等人為了滿足在福州的西方人需要，又在南台外國人社區興建了一所規模更大的教堂。麥利和說：「在與這個口岸上的一些外國居民交談時，不少人建議我們在這塊土地上修建一所包括兩個聽道室的教堂，一處用中文佈道，一處用英文佈道。考慮到這個口岸日益增長的外國人社區，我們很有必要盡速提供一個用英文進行教會禮拜活動的場所，我們一些商人朋友為此捐獻了1,000美元。在這種情形下，我決定利用這些捐款建一所教堂。」<sup>20</sup> 1956年10月18日、12月28日，教堂的中文講道室、英文講道室先後建成。教堂名「天安堂」，「其名堂之義，則取基督凡勞苦負重而就我者，則錫爾安之訓，且符故山之名。」<sup>21</sup> 對於這兩座教堂的建立，麥利和非常滿意。他說：「洋頭口的教堂使我們非常滿意，天安堂對我們的教會而言也是極有價值的進展。我本人無法表述這兩個教堂給我帶來的歡樂。經過在小巷、暗室、路邊和公共集合地多年漫無目的、充滿苦澀的傳道服務後，我覺得如今能夠站在如此壯麗的建築中向這些迷途的異教徒講述十字架的故事已是很重大的進步。」<sup>22</sup>

19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p.210.

20 Ibid., p. 206.

21 林顯芳，《福州美以美會史》，頁130。

22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p.210.

1857年，距美以美會來華傳教已近10年。福州一些下層社會市民逐漸與麥利和熟識、相知直至改信基督教。1857年才有一位加入美以美會的華人教徒。這個人是陳安。陳安（永高）原籍長樂，經營小本生意。他家住城內，距閩浙總督衙門只有幾步之遙。1855年，他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參加了麥利和在洋頭口佈道所的一次佈道，頗受感觸。後來，他又找到了天安山拜訪麥利和。麥利和邀請他參加每週五下午在天安堂舉行的聚會。在與麥利和的交往中，陳安表示了願意受洗入教的想法。麥利和對陳安也非常滿意，但為慎重行事，麥利和決定親自到陳安家中瞭解情況。他說：「我們的拜訪並沒有預先通知他，可他還是非常熱情接待了我們。一走進他的屋子，我們就很高興地注意到桌上擺著許多本基督教書籍。」「我們想找一找是否有偶像崇拜的痕跡，卻一無所獲。我們非常高興，因為在這座城中至少已有了一所房子遺棄了偶像。大約6周前，陳安已經把他家中的神像全部拿來交給我們。這次拜訪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證實他是否真的丟棄了偶像。」「聊了一陣子，我便為他們朗讀了《馬太福音》第五節的一段。他們和我一起祈禱時，我不禁感慨萬千，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這座傲慢城市內的一所民宅祈禱，而這座民宅就在總督衙門附近。」<sup>23</sup> 這次訪問後，麥利和決定讓陳安加入美以美會。1857年7月14日，陳安在麥利和處受洗。這是東亞地區美以美會第一個會友。此後，許彥士、許播美、葉英官等人紛紛加入美以美會。他們構成了第一批福州美以美會信衆。

23 Ibid., p. 213.

除了在福州這個通商口岸傳道外，麥利和還希望能深入中國內地傳教。然而，19世紀40、50年代，條約規定外國人只能在條約口岸活動。在福州，「地方政府允許傳教士們到附近鄉村旅行，條件是他們必須當日即返。」<sup>24</sup>顯然，傳教士們對這樣的規定是不滿意的。1849年1月4日，麥利和、柯林兩人未經地方官允許，私自乘舟上溯閩江直至水口地方，三天後才返回福州。他們沿途觀看福建內陸地區的地理環境、社會風情，結交當地居民，希望為日後傳道活動作準備。這一次旅行後不久，福州地方當局重申，「日後任何外國人想要作長途旅行，必須先告地方當局。假如確屬必需，他們會派兵保護；假如路程過遠，他們要拒絕申請。」<sup>25</sup>

這些規定顯然不利於麥利和等人的傳教工作。1858年，形勢發生變化。同年6月，英、美、俄、法四國聯軍在天津用武力脅迫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通過這些條約，傳教士們獲得了在條約口岸以外地區活動的正式權利。1859年，麥利和等傳教士開始著手向內地鄉村地區的大規模傳教工作。麥利和在鄉村地區的傳教，最初採取的是巡迴佈道的方式——即先由已在福州入教的中國信徒或傳教士本人到內地各處巡遊開教，招收信徒。若發現某地民衆對宣講的教義有興趣，就任命一位中國信徒長駐該處負責日常教務。麥利和本人負責定期、不定期的巡視監督，並負責為入教者施洗。

麥利和鄉村傳道的第一步是福州城西面12英里的桃莊

<sup>24</sup> Ell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p. 93.

<sup>25</sup> Ibid., p. 19.

(To-Chang)、牛坑 (Ngn-Kang) 兩地。1859年，剛入教不久的許播美在桃莊地區，向原來世交的李姓一家人傳道。麥利和說，「他的努力沒有白費，李姓一家人中的年輕成員開始加入福州的聚會。」不久，李姓一家人表示願意加入教會。有鑑於此，麥利和、許播美兩人一道到桃莊李家訪問。當地的鄉民非常熱情地接待了麥利和。麥利和說，「他們淳樸的風俗，熱情的款待使我感到精神振奮。我們到來的消息傳遍了整個山村。」「許弟兄和我輪流為大家佈道演講，我們的佈道會非常熱鬧。聽眾們的討論不時打斷了我們的佈道講演。」「這一情景令我非常詫異，更令我感到驚喜。」「多年來，我在中國傳道遭受到的是無數次的失望和冷遇。今天，我終於可以高興地看到，在中國人的屋簷下，耶穌成為受人歡迎、尊敬的客人。」「我們的佈道會結束時已過午夜，而我卻毫無睡意。剛剛過去的那一幕令人激動的情景一直在我心中在迴繞，直到清晨，獵人們的喊聲和射進屋子的晨曦告訴我：新的一天開始了。」<sup>26</sup>

「次日，我訪問了鄰近的幾位居民。有些人堅持反對這一教義，其他人則對宗教問題沒有絲毫興趣。然而，確有幾位村民對我宣講的教義表現出富有睿智的興趣。」「在這次探訪過程中，我所住在李姓一家中已有9位成員簽名願意接受洗禮。鑑於這個山村中如此有希望的情形，我們決定將這個地方納入日常傳道工作，規定每兩周在李姓村民家中佈道一次。」<sup>27</sup>此後，麥利和又到距桃莊2英里的牛莊佈道。同年3月13日、8

<sup>26</sup>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pp. 289, 290.

<sup>27</sup> Ibid., p. 291.

月 21 日，麥利和為桃莊 12 名成年人作了洗禮。對於這次鄉村傳教，麥利和感到很滿意。他說，「我們傳教工作由福州向西部鄉村拓展，這是我們在華差會歷史中一段重要而順利的發展時期。」<sup>28</sup>

1859 年，麥利和已在中國傳教工作了 11 年。福建地區的美以美會初步建立了一個較完整的傳教體系，並首度將傳教活動擴展到福州口岸以外的鄉村地區。可以說，此時福建美以美會的草創階段已經結束。

1859 年秋，麥利和攜家人回美。1860 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強迫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近代史所謂「條約體制」初步形成。此時的麥利和則在美國四處演說自己在華的傳道經歷，呼籲更多的人到中國宣教。據後來在福建宣教的薛承恩（Nathan Sites）夫人回憶，「薛承恩曾參加北俄亥俄州的教務聯合會」，「他在聯合會上遇見麥利和。他是位剛從中國回來的傳教士。麥利和那時正帶著大家唱讚美詩。」兩人一見如故，薛承恩原先的傳道點是在印度，麥利和請求會督改派他到福州傳道。1861 年 6 月 1 日，麥利和一家與薛承恩夫婦乘坐快速帆船「Kathy」號駛離紐約港，再度踏上來華傳教的航程。同年 9 月 19 日，麥利和一行人到達福州，開始了在福建佈道活動的第二個階段。這時的福州美以美會已有傳教人員 22 人，其中本地佈道員 6 人；擁有 7 個傳教點，分別是洋頭口的真神堂、天安山的天安堂、福州城西的一處佈道所、倉山下渡堂、觀音井、桃莊、牛坑等地。麥利和並不滿足於此。他要以福州倉山地區為

<sup>28</sup> Ibid., p. 221.

佈道中心，一方面拓展美以美會在閩北、閩中的教務；另一方面推進在福州城內的教務活動。由於美以美會在福州城內沒有地產、教堂，麥利和希望能在 60 年代使美以美會進入福州城內購買土地。1862 年 11 月，麥利和說，「以前我們實在不能在城裏購買地基，所以我們都住在城外，現在環境改變了。我們建議我們（傳教士）中間儘早搬兩家進城，將我們現有的房子變賣一所或二所，將所得錢作為遷移之用。我們選擇了一項好的所在，就在城北區，該地地主願賣給我們。只是本城紳士，恫嚇他們不得賣地給我們，所以這人不敢賣了。我們此事的進行因此停頓起來。」<sup>29</sup> 1863 年，麥利和等人經過努力，在福州城內東街拱星鋪租住民房作為宣教地。馬爾定（Martin）牧師、許揚美兩人負責這所城內的教堂。1864 年 1 月 17 日（同治 2 年 12 月初 9），這處教堂遭反教群衆拆毀。當日，馬爾定等人正在做禮拜。「是日晚，民衆路過教堂，見堂內住有婦女，懷疑教會引誘婦女，憤恨交加，便將教堂拆毀」，「旋經福州當局供訊查詢，知教堂內婦女為看守教堂之許揚美眷屬，並非引誘藏匿。」<sup>30</sup> 此後，雖然當局令肇事者賠償了事，但這個傳教點還是關閉。

經過這番波折，麥利和等人在福州城內傳道工作更加困難。1867 年，「當美以美會傳教士們為他們的整體工作上進展歡欣鼓舞時，在南台和城內的教堂只有 30 名受洗信徒，相比之

<sup>29</sup> 力維弢，〈美以美會七十五年之經過〉（羅運炎譯），《中華基督教歷史》（甲編），頁 205。

<sup>30</sup> 林文慧，《清季福建教案之研究》，（台灣商務印書館），頁 8。

下，在各處分站卻有 156 名受洗信徒。」<sup>31</sup>顯然，鄉鎮地區的教務擴展要快過城市地區。正如麥利和自己所說「基督福音在這些鄉鎮村莊中淳樸的居民之中贏得了勝利。這一勝利及時有力地鼓舞了我們的傳教信念和工作熱情。」<sup>32</sup>

1862 年，麥利和領導下的福建美以美會開始了鄉鎮拓展計畫。他首先把傳道活動拓展到福州附近的各郊縣。古田縣是他進入的第一個地區。據載，「按教會之入古田，自 1862 年始」，「溯其首先入境傳教者為麥利和。」1863 年，麥利和再度前往古田傳教，起初住在古田三保吉祥寺，「嗣租一保陳理坦家為古田傳教，首先入教者有張求美、劉揚名、楊更生三人。」<sup>33</sup> 1864 教堂。首先入教者有張求美、劉揚名、楊更生三人。」<sup>33</sup> 1864 年，福建美以美會已在古田、福清、閩清等地建立傳道站，吸納衆多信徒。<sup>34</sup> 為了防止和美部會、聖公會等差會彼此爭奪教區、信徒，麥利和代表美以美會，和美部會、聖公會等差會的領導人商議，用劃分傳教區的方式解決爭端。1865 年春，麥利和向美國總會報告，他們已同美部會達成協定：將樂、永泰劃歸美部會傳道區。美以美會結束這兩地的工作，集中發展閩清、古田的傳教工作。<sup>35</sup> 同年，麥利和與福州、廈門兩地其他省會附郭之侯官、閩縣，及古田、屏南四縣作為三會公共佈道之區。<sup>36</sup> 教區劃分後，福建美以美會佈道活動更加活躍。

31 Ells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p. 78.

32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p. 222.

33 林顯芳，《福州美以美年會史》，頁 141。

34 Ells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pp. 95-96.

35 Ibid.

36 林顯芳，《福州美以美年會史》，頁 7。

1866 年，美以美會已成為福建省內勢力最大的一個新教差會。有鑑於此，麥利和經佈道部同意，於 1866 年成立福建地區美以美年議會。年議會由外國牧師、中國傳道員組成，每年舉行一次，「時當草創，事務簡略，由美之佈道部遙領其事。每屆年會就地互選資望深者為主席，如例辦事。」<sup>37</sup> 實際上，從 1866 年（同治 5 年）第一屆佈道年會召開直至 1871 年（同治 10 年 10 日）第 6 屆佈道年會期間，除了第 4 屆一度由佈道部派遣來亞洲地區視察教務的金執爾會督（Kinsley）臨時擔任主席外，其餘五屆皆由麥利和擔任主席一職，總理全省各地佈道活動，直到 1871 年末離開中國為止。通過這個年議會，麥利和進一步鞏固了他在福建美以美會中的領導地位。

1867 年，麥利和的佈道足跡踏出了福州地區，到達福州南面的興化、莆田、永春等地。莆仙地區的教務原是中國教徒林振珍開闢，入教信徒多集中在南日島。1867 年 9 月，麥利和親自帶薛承恩牧師上島視察，為信徒施洗。渡海中，「不勝風濤澎湃，頗覺難支。」麥利和說：「我們至終平安，到達南日，親愛的林弟兄，同一班男女教友，都在岸上等候，歡迎我們，他的小女兒，用雙手牽我，領進教堂，四面都充滿著問安的聲音，使我們覺得，不惟遇這風浪的海峽，就是遠涉重洋到此，也是值得。」<sup>38</sup> 他巡視了南日島上的教堂，為 25 名信徒施洗。1868 年 4 月、5 月間，麥利和再次和劉海蘭牧師（H.H. Lowry）一道在福清、莆田、仙遊等地傳教，在「雲利和企坑兩村設

37 同上註。

38 張福基，《興化衛理公會史》，頁 14。

堂，吸收教徒四十餘人。」<sup>39</sup> 在這次南下傳道的途中，他們共為 71 名成年人施洗，接納入美以美會。此後，美以美會在莆田、仙遊地區勢力大增。其後「興化立為教區，轄十牧區」，麥利和親任該教區的長老，領導該地的教務工作。張福基在《興化衛理公會史》中說，「興化教會，雖由林牧師開設，亦為麥牧所翼長，數年來指導維持，即竭其力，又不憚艱辛，親臨訓迪，先進牧人，受其薰陶，初期施洗，多由其手，蓋麥牧之於興化教會，可謂勞苦功高已。」<sup>40</sup>

1869年，美國總議會派金執爾牧師來華視察，兼領福州年議會主席。麥利和則改任真神堂教區長老司，同時負責福州地區的教會學校和美華印書局的工作。同年9月22日，麥利和代表在華的美以美會傳教士前往上海迎接金執爾。在滬期間，麥利和結識了同屬衛斯理宗的監理宗傳教士林樂知。麥利和並且向林樂知介紹了福建教會情況。林樂知說，「福州麥牧師在上海談教會，始知福州雖有阻教，仍多入教，今歲登名入教者凡八百八，轉較他處為多，可見真理自有信人不懼阻毀也。」<sup>41</sup>

1869年10月6日，金執爾會督到達上海。同年11月16日到22日，金執爾與麥利和回到福州參加年議會。在這次年議會上，北京、九江兩地脫離福州年議會的管理。麥利和繼續擔任福建地區的教士長，兼領真神堂長老，管轄下屬3個「連環」，即福州的真神堂、天安堂、以及南平的福音堂。南平福音堂是薛承

<sup>39</sup> 陳紹勳，〈基督教傳入莆田史料〉，《莆田文史資料》（5輯），頁176。

40 張福基，《興化衛理公會史》，頁 29。

(1) /教會新聞》《中西教會新報》(1870年8月20日), 頁145。

恩牧師創設，下轄建陽、武夷山各處傳道點。1870年冬，麥利和、武林吉一起前往閩北地區視察各地教務，瞭解閩北風土人情，他並且慕名前往理學家朱熹出生地尤溪參觀。1871年春，他回到福州。此次閩北之行是麥利和在福建最後一次內地佈道活動。1871年底，麥利和收到美國總會方面令其回國述職的書信。同年12月10日，麥利和登上蒸汽船「亞速」號離開了中國，途經香港、印度、巴勒斯坦、伊斯坦布爾、德國、倫敦。次年春回到美國。

1873年，麥利和受命前往日本橫濱，開創了日本衛斯理宗。在日本，麥氏創辦日本東京青山書院、參與日文新約聖經的翻譯工作。1884年，麥氏前往韓國，從李氏王朝處獲得傳教允許。1887年，麥氏結束了海外傳道的工作。1907年8月18日，麥利和病逝於美國洛杉磯市。

## 二、麥利和與清末福建教會教育

教會教育是清末外國傳教士在福建傳教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近代福建教育的源頭之一。在福建教會教育中，美以美會扮演過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創辦的大批各類學校，培養出許多優秀的人才。教會教育的演變是與教務拓展同步的。若以教育機構的性質為劃分標準，早期福建美以美會的教育活動可分為日間校（Day school）、寄宿校（Boarding School）、書院（College）三個階段。麥利和參與了三個階段的發展。

## 1. 日間學校

日間學校是麥利和等傳教士來閩之初採取的教育方法。在日間校，學生早晨上學、傍晚離校。傳教士們來福建開辦學校，自有其主、客觀的原因。從客觀上講，開辦學校是傳教的重要手段。當時傳教士們「雖言之諄諄，而聽之藐藐。甚而有拒而不納者，將欲設堂立會，誠爲萬難之事，於是乃開學校爲佈道先驅。」<sup>42</sup>不過，美以美會在入華傳教前已經有開辦教育事業的經歷。美以美會認爲，「學校在最早期的傳教實踐中是十分必要的。在任何地方，沒有訓練出對神敬畏的青年人，建立永久的基督教事業是不可能的。」「在中國，勞力低廉，文化衆多。辦學似乎是擴大基督教在華影響的絕好手段。」「我們派往的傳教士應據實際情況儘快開設男女學校。」<sup>43</sup>麥利和認同差會的觀點。他說，開辦學校「可以使我們瞭解中國人的稟性」「學校的工作使傳教士們有機會練習並提高漢語水準。通過學生的聯繫，我們還能與他們的家庭建立聯繫。」<sup>44</sup>顯然，麥利和創辦教育只是西方近代宗教教育在中國的延伸。

美以美會在福建的第一所學校是柯林牧師於 1848 年 1 月 28 日在中洲島住處內開辦的日間學校，校內只收男生。麥利和初到福州，就參加了柯林的教育工作。1851 年，柯林因病返國，福建的教育工作由麥利和負責。麥利和將這所日間校「搬

<sup>42</sup> 林顯芳，《福州美以美年會史》，頁 190。

43 E. L. Ford, *Methodist Episcopal Education in China*, p.12,13.

<sup>44</sup> Ells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p.52.

45 E. J. Ford, *Methodist Episcopal Education in China*, p. 38.

到一條名為倉山的街上，麥利和的住所就在該校附近。這一學校的工作也就由麥利和負責。」<sup>45</sup> 在這所日間校，宗教知識、中國經書、淺近的自然科學常識成了全部的教學內容。學校早期的教師是位粗通文墨的中國文人，「半天時間由這位中國老師教授一般的中文典籍」，「另外，半天時間則花在中文閱讀基督教書籍上。傳教士一天一次，或幾次到學校視察，用他有限的漢語知識和學生交談。」<sup>46</sup>之所以早上半天時間講授儒家經書，完全是為了吸收學生入學能夠堅持下去。而下半天的教理學習才是麥利和真正的辦學目的。教學內容中，自然科學所占的比例很小，基本上只有簡單介紹並無系統的說明。

在教學方法方面，麥利和聘請的中國教師在教授時，教學方式與本地的學堂並無二致。「學習的理論就是要求每個學生逐字逐句用最大音量反複誦讀。同時，其他男孩子也用同樣方式誦讀，中國先生則坐在一旁糾正他所聽到的錯誤。」<sup>47</sup> 麥利和並不欣賞這種教學方式。在解決語言交流上的問題後，麥利和開始為學生教授基督教理。為了提高宗教課的效果，麥利和一改讓學生大聲背誦所學內容的辦法，而採用師生之間的問答，讓學生掌握有關內容。麥利和說，「我用提問的方式進行教學，給所有學生以機會說出他們所學到的知識。這有助於他們加深記憶，也使我掌握了使用當地語言的正確方式。」<sup>48</sup> 麥利和是這樣教導學生的：

<sup>46</sup> Ibid., p. 38.

<sup>7</sup> Ells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p. 52.

3. Ibid.

「一共有幾個上帝存在？」我問。  
 立即所有學生都伸出食指，大聲回答：「只有一個。」  
 「他是全知全能的嗎？」  
 「是。」  
 「他創造萬物嗎？」  
 「對。」  
 「那麼誰創造了你？」  
 「上帝。」<sup>49</sup>

在教育物件方面，麥利和夫婦一起創辦了福州最早的女子學校。在中國，人們自古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婦女社會地位低下，不能與男性享有同等的教育權利。有鑑於此，麥利和十分重視女子教育的建設。1850年，麥利和夫人來到福州後，與麥利和一起著手創立福州第一所女子日間學校。1850年12月30日，麥利和夫婦創辦女學正式開學，共有11位女孩子入學。此後「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麥利和夫人組建了一個由25個學生組成的學校。每天平均有15個女孩子上學。」麥利和說，「我們的計畫是讓女學生們在家裏吃早飯。9點鐘上學，和我們一起吃中飯，下午4點鐘回家。這一安排可以使她們白天都在我們監護之下，那些離校較遠的女學生也因此能及時趕來。考慮到這些女孩子因裹腳不良於行，只有如此安排才能使她們來校上課。」「我們雇請了一位中國先生負責為學生上課，麥利和夫人也盡其所能參加教學活動。我們教這些女孩子

<sup>49</sup> Ibid.

讀書、寫字、唱歌、基本地理學、算術等等。用於閱讀的教科書包括一些用短句闡述教義的小冊子，教義問答手冊，讚美詩以及聖經上一些章節。」對於這所女學，麥利和相當滿意。他說，「建立女子學校的計畫對中國人來說是件令人驚奇的事」「也許對美國人而言，給女孩子上課是日常生活的小事。但我們認為，這所女子學校的作用絕對不僅限於她們閱讀能力的提高。這些女孩子每天參加對天父的祈禱，與虔誠的女傳教士和睦相處。這一經歷將在她們以後的歲月中留下對基督教難以磨滅的好感。進一步而言，事實勝於雄辯。這所女子學校的建立很有力地宣傳了我們的信念——女性的靈魂與男性的靈魂同樣是高貴的。」<sup>50</sup>

總的而言，麥利和在19世紀50年代初期的教育活動中引進了舊有教育體制所沒有的新內容、新方法，尤其是女子日間校的創辦更是開福建近代女子教育的先河。1852年，佈道會的年度報告說，「麥利和弟兄的學校在正常進行著。有幾位學生從開始就一直留在學校裏學習。他們在福音真理的學習上有很大的進步。」<sup>51</sup>但是，這類由中國先生負責、傳教士監督的學堂沒有固定的學制，經費來源不穩定。若遇上傳教士外出或經費不繼，日間學校時常被迫停辦。肯來校就讀的全是貧苦人家的子弟。為了吸引學生，麥利和夫婦還以提供膳食、津貼等方式招納學生。麥利和說，「女孩子的父母都很窮。於是我們決定每週發給每個學生2.5美分，用來買書本、文具。」但

<sup>50</sup>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pp. 234-235.

<sup>51</sup> E. L. Ford, *Methodist Episcopal Education in China*, pp. 37-38.

是，這類學校的效果是極有問題的。「學生一般很小，以往也沒上過學。他們學了一兩千個字後，大部分轉到別的學塾上學，或去做生意。而且，他們的宗教修養也沒有多少進步，沒有一個人成為基督徒。」<sup>52</sup>

## 2. 寄宿學校

由於日間校的效果不理想，麥利和等人認為必須建立更完善、更嚴密的教會教育系統，將學生完全置於教會的照管之下，才能培養出教會真正需要的人才。1855年，其他美以美會傳教士紛紛來閩。1856年，美以美會從美國旗昌洋行駐福州辦事處買到一處房舍作為女寄宿學校校舍。麥利和說，「這所房子很寬敞，屬木結構，明顯是由那些不熟悉西式結構的木匠們建築的。」<sup>53</sup>由於負責女子寄宿學校的女傳教士尚未到福州，這所校舍先用作男寄宿學校的宿舍。同年11月26日，男寄宿學校創立。1859年，美以美會用500元墨西哥銀洋重新建築了一所新校舍。男寄宿學校搬入新校舍，原來校舍轉交給新來的女傳教士。

在辦理寄宿學校時，麥利和對招生辦法作了規定。麥利和說，「在學生和我們一起生活時，我們將為他提供膳食、衣服、書本以及住宿。如果在公平的考試中，哪位男生不能使我們滿意，我們有權斥革。但無論何時，假如這位男生違背我們的意願離開學校，那麼他的父母和監護人必須向教會賠償男生

52 Ells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p. 52.

52 Ellsworth C. Clark, *Methodist Education in China*, p. 42.

54 R. S. Malc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p. 232.

在校期間得到免費衣食費用。」<sup>54</sup>男、女寄宿學校，招收的學生多在12歲至18歲左右，學制4至5年。在課程設置方面，為了獲得中國社會的認同，學校保留了相當多的時間教授中國典籍，同時相應加強向學生灌輸宗教思想，講授一些有關的自然科學知識。「《聖經》是學校主要的教科書，我們的目標是要讓《聖經》神聖的教義浸透每位學生的心靈。我們也必須利用我們擁有的條件向學生灌輸有關自然科學的知識，藉以提升他們的思想，使他們認識到，我們指導他們認識的上帝是值得作為宗教信仰唯一恰當的神靈加以崇拜的。」<sup>55</sup>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兩所寄宿學校課程大體相同，包括基礎性的，而後較深的基督教倫理和教義書以及地理學、歷史學、天文學、數學各科的論著，並伴以每天的聖經閱讀。在女校，校方還教授縫紉針線和家政管理。」<sup>56</sup>在培養目標上，傳教士們希望寄宿學校可以讓學生能皈依主，更盼望能夠培養出福建本地第一批宣道師。麥利和說，「在學校，我們希望能培養一批有才華的年輕人，他們將為這漫漫長夜帶來一絲光明。我們希望把學校辦成基督教的宣傳機構。這裏將培養出有著使徒般熱情勇氣，具有宗教獻身精神的年輕人。他們將在這龐大的帝國上廣布基督的真理。」<sup>57</sup>

55 E. L. Ford, *Methodist Episcopal Education in China 1847-1880*, p. 86.

56 Ibid.

57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p. 235.

「傳教士一到達中國的傳教地區，第一個主要工作就是儘快盡好地掌握與民衆口頭交談的能力。」<sup>63</sup>「一般而言，傳教士們到福州幾天內，就開始學習福州方言。對於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說，語言學習是項永遠無法完成的任務。」<sup>64</sup>不少人因此被迫離開福州。在來閩傳教士中，麥利和是最快掌握福州方言的傳教士之一。1848年4月他來到福建，1849年1月，他就能與福州教區的鄉民用福州話自由交換。而據當時在廣州傳教的美國衛三畏說，當時一般「在每個傳教士有效工作年數中，要減去整三年的學習漢語的時間。」<sup>65</sup>

此後的20餘年，麥利和不斷積累總結福州方言和漢語方面的知識。1870年，他與同時在福州傳教的美部會的摩儻(C.C. Bladwin)合作，共同編纂了歷史上第一部供西方人使用的福州方言辭典，作為英語國家的人們學習福州方言的工具書。該書的英文名稱是 *An Alphabet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Foochow Dialect*，又稱《福州方言辭典》。該書由麥利和發起、策畫，麥利和、摩儻合作編寫。全書分為前言、使用說明、正文、附表四大部分，共1130頁。其中，前言部分、正文上半部由麥利和編寫。麥利和負責全書的校對出版工作，福州美華印書局承印，書本售價9美元。麥利和、摩儻的福州方言辭典參考了福州地方韻書《戚林八音合訂》。所謂《戚林八音合訂》是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編寫的《八章字義便覽》

63 Ibid.

64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p. 193.

65 衛三畏，〈基督教會在中國傳教活動的統計〉(1855年7月1日)，《太平天國史譯叢》(第2輯)，(中華書局，1982年)。

與林碧山《珠玉同聲》這兩本福州地方音韻書的合編本。《戚林八音合訂》一書把福州方言的聲韻分為36韻，15聲，按平上去入、清濁高下分為8個音調。麥利和、摩儻根據該書的音韻拼讀法，加以羅馬字母化，創制出福州音羅馬字。因此，所

福州音羅馬字	福州土白字	英文
a-pieng	鴉片	Opium
a-pieng-guang	鴉片館	An opium shop
a-co-ma-co	鞋做賣做	Can you do it, or not
a-deang	鞋中	It is worthy
a-co-ga	鞋做家	Frugal, industrious

謂福州音羅馬字是一種利用拉丁字母書寫的福州方言話音字。「簡單易學，短時間就可以學會。」<sup>66</sup>這種福州羅馬字不僅是外國傳教士學習福州方言的入門工具，更使許多原先不識字的福建本地教徒可以閱讀宗教書籍。它與所謂的「福州土白字」一樣都是當時福州教會內通行的表達文字。在方言辭典中，麥利和、摩儻將福州方言羅馬字、福州土白字、英文釋義並列編排。現摘取辭典正文一段以作說明：

對於這部辭典編纂的意義，麥利和認為，「用辭典記錄中國大部分重要的方言也許是這個時代迫切的要求。漢語中的習慣語、成語、俚語是如此繁複。對於那些試圖改變中國人思想，或想正確認識華人性格的外國人而言，重視漢語的基本法則是絕對必要的。這部辭典的材料是我們在作為傳教士的二十多年的工作學習中，通過各種管道親自收集整理的。我們非常希望這些材料永久傳留下去，為後來者學習，使用中國語

66 陳德金，〈憶「舊電線書齋」〉，《福建文史資料》(第20輯)，頁93。

言服務。上帝保佑，我們很高興能夠使這一願望變為現實。我衷心希望這本辭典能對學習中國語言的人們有所幫助，也希望這本辭典能有助於西方國家與中國的友好交流；更希望它能夠推動在華基督教事業的發展。」<sup>67</sup>

麥利和這部方言辭典在傳教士中間獲得廣泛好評。1870年10月，《教務雜誌》刊出特稿，詳細介紹了這部辭典的內容及意義。文中認為「假如有人認為這部著作的售價過高，那麼則相信，即便價格漲到原來的5倍。這版著作也會售賣一空。」「我們希望這部辭典有足夠的印數以備後來的傳教士以及其他研究學習福州方言。這部辭典會給人們帶來極大的方便，對研究其他方言的人們也有很大的幫助。」<sup>68</sup>事實上，麥利和、摩憐兩人編纂的這部《福州方言辭典》是現存最早的英文福州方言辭典，在版本學、語言學上都有重要的研究價值。1870年，該辭典多次再版。

## 2. 譯著宗教典籍

除了編纂福州方言辭典，麥利和譯著了大量宗教書籍。在譯著工作中，《新約聖約》是麥氏翻譯工作的重心。基督教自唐貞觀9年（西元635年）傳入中國，迄今已逾千年。但是，《聖經》的翻譯工作時斷時續。目前已知最早較完整的《聖經》譯本是清代乾隆耶穌會士賀清泰翻譯的《古新聖經》，與景教、

<sup>67</sup> R. S. Maclay & C. C. Baldwin, *Alphabet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Foochow Dialect.*

<sup>68</sup> Ibid.

天主教不同，英美各新教傳教士更強調基督徒應該親自閱讀《聖經》。因此，他們十分重視《聖經》。1811年，英國浸信傳道會傳教士馬士曼（Joshua Marshman），以倫敦大英博物館藏抄本《四史攸編耶穌基利斯督福音之會編》為底本，把《新約聖經》譯成中文。1822年，他又將《舊約聖經》譯成中文。馬士曼譯本是迄今為止最早的一部完整中文聖經譯本。此後，各差會陸續展開了《聖經》的翻譯工作。其中，1850年上海聖經翻譯委員會的翻譯工作最為著名。

在福州，「大部分對基督教感興趣的人是社會下層百姓，而不是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這一事實，加之新教教義中讓信徒、慕道友能夠自己閱讀《聖經》的重要信念，使傳教士們渴望把《聖經》譯成未受任何教育的人們能夠閱讀的文字。」<sup>69</sup>麥利和翻譯《新約聖經》，採取逐步譯介、合作出版的方針。1854年，他翻譯完成《約翰福音》，1855年譯完《彼得前書》、《彼得後書》、《約翰一書》、《約翰二書》、《約翰三書》。1863年，麥利和翻譯了《新約聖經》的節略本，內容包括四部福音書，全書共118頁。1865年，《馬可福音》單獨出版。<sup>70</sup>

1866年，麥利和在以往譯經的基礎上，與摩憐、夏查理（Charles Hartwell）合作，出版了據認為是福州方言本《新約聖經》的「第一標準版」、「基礎版」，全書共248頁，稱為《聖經新約全書》，為福州美華印書局刻本。這是第一部比較完整的福州土白字《新約》譯本。除了翻譯《新約聖經》以外，麥利

<sup>69</sup> Ells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p.60.

<sup>70</sup> Ibid., p. 61.

和翻譯撰寫了許多宗教性書刊，作為傳教的輔助以及教會學校的教材，茲列表如下：<sup>71</sup>

年份	書名	內容	頁數	語言
1856年	Sie Wang Chuang Ung	宗教	14頁	福州音羅馬字
1857年	覺世文	宗教	缺	官話
1857年	祈禱文	宗教	缺	官話
1857年	受洗禮之約	宗教	17頁	官話
1858年	美以美教會禮書	宗教	13頁	官話
1859年	讚美詩歌	宗教	6頁	官話
1865年	信德統論	宗教	20頁	官話
1865年	美以美教會禮文	宗教	44頁	福州土白
1865年	榕腔神詩		53頁	福州土白
1866年	約伯紀略	宗教	62頁	福州土白
1873年	批信連新聞	宗教	10頁	福州土白

上表所列的是麥利和在閩傳教期間，除了新約譯本外的所有著作和譯作。這些作品頁數不多，都是宣揚基督教教義，介紹美以美會規程，解答宗教問題的小冊子。這些作品所用的語言或是淺文理的官話，或福州土白，通俗易懂，生動活潑。現摘錄麥利和在翻譯《聖經新約全書》中的一段文字，「汝昧見著耶穌，也愛伊，今昧看見，汝也信伊，就大歡喜，者歡喜是極榮耀，講賣盡。汝和者信其應驗，就鞋救汝靈魂。」<sup>72</sup>這種純口語化的文體十分適合當時福州下層百姓的閱讀需要，因而被大量印刷，四處散發。

對於清末新教傳教士的翻譯工作，現代新文學運動的參與者周作人有這樣的評價，「我記得從前有人反對新文學，說這

71 Alexander,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p. 177-178.

72 《聖經新約全書》(福州美華印書局，1866年)，頁83。

些文章不能算新，因為都是從《馬太福音》出來的。當時覺得他的話很可笑，現在想起來反要佩服他的先覺。」<sup>73</sup>他認為傳教士們譯著宗教典籍「在中國語及文學的改造上也必然可以得到許多幫助與便利，這是我深信的，不疑的。」<sup>74</sup>

#### 四、傳教事業與中外政治衝突

麥利和的這些教務活動，歸根結底是為了發展美以美會，在中國傳播基督教。但正如傳教士李提摩太所言，近代「中國基督教傳教士的地位是非常獨特的。」「我們不是像兩千年前的佛教僧侶那樣，被邀請來中國提供一種深刻的感情需要，也不是像一千多年前的景教徒，被賜與土地和廟宇，也沒有像兩百年前的耶穌會士，受到皇室的寵愛和眷顧。」「我們無數的教育和慈善設施，至今絕大部分不是由中國的資金支助的，相對而言，我們的宗教也不為人民所欣賞。」<sup>75</sup>不惟如此，近代入華的基督教傳教士與中國本土社會之間衝突不斷。

##### 1. 條約體系、強權干預和教務拓展

1844年7月3日，清廷、美國簽定《望廈條約》。條約內規定，「合衆國人民在五港口貿易，或久居或暫住，均准其租憑

73 周作人，〈聖書與中國文學〉，《小說月報》(12卷，第1號)，頁7。

74 同上。

75 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頁43。

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樓，並設立醫館、禮拜堂及殯葬之處。」<sup>76</sup>  
這一規定為基督教傳教士在通商口岸活動提供了法律基礎。麥利和正藉著這項條款來闡傳教的。

利和正藉著這項條款來閩傳教的。美國史學家泰勒·丹涅特認為，「美國傳教士存心得寸進尺以圖強迫帝國開放的情形是昭昭在人耳目的，這和傳教界自從最初時起就一直盛行的那種精神是完全相符的。」「在 1858 年，傳教士們受到太平起義很大的影響，他們大都予以深厚的同情，並且看來它頗有革命成功的希望。對於清政府，傳教士們殊少敬意，至於帝國的主權和完整，在他們看來卻比開放傳佈福音之門的重要性差得很多。他們的政策不是很有遠見的政策。」<sup>77</sup> 這當然是相當負面的評價，但卻道出晚清來華傳教士大部分人的實際心態。麥利和是個虔誠的基督徒，懷著十字軍式的傳教熱忱。他批評，「這兒（福州）民族情緒的影響力在沿海各開放口岸中除廣東外是最激烈的。」「從一開始，這座城市的地方當局就已表現出強烈的仇外情緒。」<sup>78</sup> 既然麥利和認定基督教之所以受到中國社會的排斥是因為中國政治力量的干預，因此，麥利和盼望西方政治軍事力量介入傳教運動就不難理解了。1856 年，中英之間發生「亞羅」號事件，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同年，美國海軍與清軍在廣州發生了小規模衝突，消息傳出，「麥利和牧師對事件的發展感到高興。他在《宣教之聲》（*Missionary Advocate*）上撰文呼籲，美國應該放棄孤立主

<sup>10</sup> 姚德新、梁德主編，《中外約章匯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

77 泰勒·丹涅特，《美國人在東亞》（商務印書館，1999），1847-1880，p. 43.

78 Ells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8*, I.

一、美國傳教士在福州：麥利和吳謹言

義，與英國聯手進攻中國。」<sup>79</sup> 1858年，滿清朝廷與列強簽訂《天津條約》，1860年又簽訂《北京條約》。這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條約正式形成晚清數十年的條約體系。而且「在這些條約所裏，由於傳教士的參與策畫，全都塞進了容許在中國傳教的所謂『寬容條約』，用條約形式固定下來。」<sup>80</sup> 傳教士的活動範圍再也不限制在通商口岸。對此，麥利和是非常興奮的，「1858年的春天，中國政府與英、法、俄、美四國政府簽署了商業及和平條約。這些條約中的規定富有自由精神，從此，中國對外關係史進入一個最光輝的時期。1859年，清朝軍隊在白河口對英法艦隊背信棄義的攻擊，這險些使原先令人興奮的前景化為泡影。1860年，英法聯軍再次在華北地區取得輝煌勝利。他們摧毀了大沽炮臺，火燒北京附近的圓明園。這些打消人們原先的疑問。」<sup>81</sup> 麥利和說，「這一變化真是太好了。我們希望這一變化能夠延續下去。」「在這一事件中，不管中國政府從危機中的認識有多遲緩，也不管中國政府是多麼不願意兌現英法聯軍提出來的合理要求，它現在確實明白了自己真正處境，開始認真執行最近條約中的條款。當然，今後中國政府還可能試圖逃避，誤讀條約中的規定。西方國家還有可能被迫用武力捍衛他們的權利。但我們相信，如今中國政府已不可能走回頭路了。近來的軍事行動也無須年年進行。進步是不可避免的。中國現在已完全公平地為基督教、對外交往敞開了大門，我們希

<sup>79</sup> Fairbank,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p. 260.

<sup>80</sup> 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63。

81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望它能夠堅持下去。」<sup>82</sup>

麥利和在華傳教的二十餘年中，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席捲大半個中國。面對著這場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運動，不少傳教士抱著同情、讚賞的態度，因為他們發現太平軍信奉上帝教的許多教義來自基督教。麥利和也是其中之一，他說，「他們承認信仰《聖經》上的主要教義，並根據書中的戒律規範他們的生活。他們在自己的統轄區印刷、發行《聖經》中的一些章節，宣傳三位一體上帝的存在。太平軍痛斥所有形式的偶像崇拜，摧毀異教的廟宇，破壞偶像。他們還根據自己對基督教教義不完整的認識，試圖在中國建立起對唯一真神的崇拜。」麥利和指出，「從宗教角度來看，這場運動的影響必將是長期、深遠的。」但是，麥利和並不認為太平軍起義與傳教運動有任何關係。不僅是因為太平軍起義勝負未卜，更重要的是「在過去 20 年中，西方政府對滿清政府的影響已經在穩定而迅速地增長。」所以，「就我們目前的任務而言，這場運動的成敗根本與我們無關。」<sup>83</sup>

麥利和本人顯然對滿清政府沒有什麼好感。事實上，他認為這一政權的唯一長處就是它的孱弱無能。因為「現政權到目前為止還是排外反基督的，它的傳統政策是頑固排斥世界上其他地區的正確知識。當朝皇帝如果有足夠實力的話，他完全可能把這一排外的政策引向極端。但值得慶賀的是，如今他已經沒有實力達成自己的願望。」儘管麥利和非常瞭解清政府的貪

<sup>82</sup> Ibid., p. 342.

<sup>83</sup> Ibid., pp. 350-352

污腐化、魚肉百姓，但他認為「滿清政府可能是最符合中國人品性的一種統治形式。任何繼之而起的新政權都不太可能會改變這一統治形式。滿清政府可能會如我們希望的那樣自由、開明。我們相信外交家們已經發現，在個人交往中，滿州官員比漢人官員較為圓滑，不那麼剛愎自用。」<sup>84</sup>因此，他呼籲西方列強支持滿清朝廷的統治。

## 2. 具體案例分析

麥利和這些言論、觀點有其歷史背景。但是，這樣的政治態度無疑會妨礙傳教活動的開展，甚至釀成教案，使基督教遭到當地社會的抵制。1851 年到 1864 年，麥利和等人與福州地方當局的租地糾紛案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

1851 年 7 月 9 日，美以美會派遣的高禮 (James Colder) 夫婦和傳教醫生懷禮 (J. W. Wiley) 夫婦等四人到達福州傳教。這使得麥利和等人原先在福州租住的住房不敷使用。麥利和遂決定在天安山上租買一塊土地，用以建房供他們居住。經過一番討價還價，麥利和與原地主訂下租用宅地合同。按規定，這份合同必須交由福州地方當局用印後方為有效。但是不等正式手續辦妥，擔任福州美以美會會督的麥利和就擅自決定在宅地上開工建造，從而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負責建造的是高禮、懷特兩位傳教士，這場糾紛在美國的外交檔中就稱為「懷特高禮事件」(White-Colder Case)。<sup>85</sup>

<sup>84</sup> Ibid.

<sup>85</sup> Jules Davids,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842-1860*, Vol.10, pp.141-218.

根據 1844 年 7 月 3 日簽訂的中美《望廈條約》中規定：美國人可以在五個通商口岸租賃民房或自行建樓，但「必須由中國地方官會同領事等官，體察民情，擇定地基，內民不得抬價勒索，遠人勿許強租硬占，務須各出情願，以昭公允」<sup>86</sup> 從這一規定可以看出，外國人雖然有權在通商口岸租地建房，但也必須「體察民情」，不得「強租硬占」。可是，麥利和等人未經福州官府正式許可，就擅自建房的行徑激起了福州居民的群起反對。1857 年 10 月 5 日，懷特、高禮募集一批工人準備動工建房時，他們遭到天安山上居民的阻攔。這些居民貼出傳單，警告美以美會未經官府用印，不得在此擅自動工建房。一時間民情洶洶，難以平抑。天安山上的居民還認為，自從這幫外國人住在南台後，附近居民的死亡數增加了。總之，這些外國人的存在嚴重影響了本地的風水，更多的外國人住在這裏只會造成麻煩、爭鬥。而且，麥利和租下的這塊土地的一個角落上，還有一個小廟龕，因此，他們反對將這塊土地租給麥利和等人使用。

鑑於民衆的激烈反對，麥利和試圖讓福州地方官出面干涉鎮壓。10月8日，福州地方當局派人平息事態。最後，當局表示只要民衆的抱怨能夠平息，他們願意發出准許建房的證明。<sup>87</sup>為此，麥利和等人必須與天安山附近居民談判解決。但麥利和對談判似乎無多大耐心與誠意。他抱怨說，「我根本不

<sup>86</sup> 褚德新，梁德主編，《中外約章匯要，1689-1949》（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87 Ellsworth C. Car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p. 38,39.

知道要用這麼大的耐心與這些人們談判。在討論結束前，我們根本無法確定合同的任何一個條款。……假如不是有天父作我的見證與支持，我絕對無法忍受精神上的損耗及不快」。<sup>88</sup> 談判最終沒有結果。福州地方當局始終不願在租地合同上蓋印，以防觸怒民衆。在這種情況下，麥利和等不僅不予理會，而且決定再次強行開工建房。「傳教士們問工人是否願意在官方批准下達前動工建造。工人表示同意，開始動手建房。幾個小時後，一群人圍了上來。這群人中的一位代表說，人們願意看到房子建起來，但一定要等待官府正式批准才能開始動工。工人們只好離去，傳教士們不得不再次等待。」<sup>89</sup> 1852年，麥利和等人決定向美國政府尋求支持。由於當時美國在福州並沒有領事官員，所以他們直接致信美國駐華代辦伯駕（Peter Parker），要求美國政府出面干預。同年3月25日，伯駕照會當時負責「夷務」兩廣總督徐廣縉，要求解釋。但這一照會被中方擱置。同年，美國政府計畫派遣軍艦「薩拉托加」號「訪問」福州。「聽到『薩拉托加』號即將前來的消息，傳教士們馬上想以此威脅地方官員作出讓步，但他們並沒有成功。」<sup>90</sup> 但是，「薩拉托加」號因故未能前來。1852年6月20日，駛抵福州口岸的是另一艘美國軍艦「普利茅斯」號。艦長是海軍中尉吉爾斯（J. T. Gills）。美國駐華代辦伯駕訓令吉爾斯與福州地方官談判。福州地方負責談判的是閩縣縣令洪毓琛。由於找不到合適

88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p. 33.

<sup>89</sup> Ellsworth C. Car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 p. 40.

90 Ibid., p. 41.

可靠的翻譯，「最後中方同意讓麥利和擔任通事，儘管他操的是榕腔，而不是官話。」<sup>91</sup>

在談判中，吉爾斯、麥利和堅持要中方讓步，同意他們的建房要求。他們威脅說，「假如中方給不出滿意的答案，另有一艘美國軍艦將『訪問』福州，以採取進一步行動。」<sup>92</sup>對於美方的威脅，福州地方官根據《望廈條約》的規定爭辯，「條約要求外國人租住產業必須同時考慮當地民衆的情緒。」<sup>93</sup>「只要鄰居中有一個人反對外國人租用宅地，那麼交易就不會得到官府的批准。」<sup>94</sup>雙方立場懸殊，談判不歡而散。此後，吉爾斯的「普利茅斯」號離開福州。1852年7月1日，官府通知麥利和，他們必須放棄這塊宅地的租用空間，收回支付的款項，並在4、5個月內找到另一個宅地。如果麥利和等人不答應，他們的住宅將無人維修，以後的十餘年中，他們也別指望在這個口岸租到其他的地。」對於福州當局的警告，麥利和仍不肯放棄租約。他抱怨吉爾斯的「普利茅斯」號離開得太早，要求伯駕另派一艘軍艦來福州。1853年，懷特、高禮等人離開福州，再也沒有回來。但麥利和仍然相信教會不能放棄原先的租約。而且，麥利和聲言，「目前擺在你我面前的問題並非只是一場爲了一塊土地和中國人之間無意義的鬥爭。這一事件涉及到一條重要原則，即作爲美國的公民，我們能否依據條約在及我們政府的有效保護下在這座城市居住並工作。」「這一問題涉

<sup>91</sup> Ibid.

<sup>92</sup> Ibid.

<sup>93</sup> Ibid.

<sup>94</sup> Ibid.

及美國政府的信譽和榮譽。」<sup>95</sup>

對於「懷特、高禮事件」，美國外交當局顯然不欲陷得太深。1852年9月，伯駕便致信福州的美以美傳教士，告訴他們如果可以找到另一個合適的土地，他們應該放棄原來的租約。1854年5月，美國新任駐華公使麥蓮（Robert M. McLane）到福州訪問。在他的勸說之下，麥利和才放棄了早已無法實現的租約。這一租地糾紛最終結束。

## 五、麥利和眼中的福建社會

麥利和來福建傳教、生活了二十餘年，是最早在福建活動的美國人之一。長期的生活工作經歷使麥利和對福建地區民間社會的生產生活有比較直接感性的體驗。更爲重要的是，他在福建社會傳播基督教文化的同時，也致力於在西方社會出版書籍，發表文章，向西方社會介紹中國與福建的具體情況。他是位勤於著述的傳教士，曾在美國、英國各地的報紙期刊上發表過多篇記述中國情況的文章。1861年4月，他利用回美國休假期間在紐約出版了《生活在中國人之間》（*Life among the Chinese*）一書。該書全面記載了他在福建傳教十餘年間的經歷與感受，較爲系統地陳述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情況，尤其是福建人民的生產、生活狀況。正如他在該書前言中聲稱，他的這些介紹「是送給關心中國福音化以及所有渴望瞭解中國這個

<sup>95</sup> Ibid.

世界上最古老、最偉大帝國的人們。」他希望，「這些介紹會有助於這樣一個光輝時期的到來；到那時，中國能夠用正確的言行表明，她已坐在我主耶穌基督的腳下。」<sup>96</sup>由此可見，麥利和的這些論著主要是為了喚起西方各界對其在福建傳教工作的重視與興趣，以利於傳教工作的開展。但麥利和的這些論著的實際作用並不僅限於此。據美國史學家泰勒·丹涅特稱，「傳教士所印行的書籍對美國亞洲政策起了一個雖然比較間接，可是更加廣泛的影響……若說此後（1847年以後）的四十年，傳教士們所寫的書籍乃是形成美國對中國、日本和朝鮮的任何正確輿論的唯一根源，實非過甚其辭。在19世紀的大部分期間，美國人是通過傳教士的眼睛來觀察亞洲的。」<sup>97</sup>不可否認的是，麥利和眼中的中國、福建社會，深深烙上了麥利和本人文化背景、傳教需要以及時代特徵。這種以特定角度觀察的結果，並不可能是真正客觀公正的。但作為早期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管道，麥利和的這些著作第一次將福建社會多層次、多角度地向美國社會介紹，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西之間的瞭解與溝通。

### 1. 福建地區的民間社會

麥利和在福建的二十餘年的傳道生活，接觸的主要就是福建的民間社會。他聲稱，「外國人把福建視為中國的新英格蘭，福建的人民則是中國的揚基佬。這是上帝賜給美以美會並要求

<sup>96</sup>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Preface.

<sup>97</sup> 泰勒·丹涅特，《美國人在東亞》（商務印書館，1958年）。

差會派遣傳教士傳道的一塊有趣而誘人的土地。」<sup>98</sup>所謂「新英格蘭」（New England）是指北美殖民地形成初期，北方以原英格蘭清教徒殖民建立的幾塊殖民地。早年，這些殖民地是基於宗教方面的原因，由傳道士、神學院畢業生在一些小商人、工匠以及自耕農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所謂「揚基佬」（Yankee）指的就是在新英格蘭各殖民地上居住的清教徒。據德國著名的宗教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分析，新英格蘭是美國最具有新教倫理的地區，因此，「揚基佬」也是最典型的富有美國式資本主義精神的人民。「早在1632年，就有人抱怨新英格蘭那種不同於美國其他地方的專門工於計算的追求利潤的行為。同樣無疑的是，在新英格蘭接壤的一些殖民地以及較後加入美利堅合眾國的南方各州，資本主義遠沒有如在新英格蘭地區那麼發達，儘管這些殖民地及州是由一些大資本家出於商業動機建立的。」<sup>99</sup>在西方人的眼中，這些新英格蘭的揚基佬守舊、精明、節儉，是最標準的美國人。曾被稱為美國精神之父的本傑明·佛蘭克林就是一位新英格蘭地區的「揚基佬」。可以說，美國的立國思想很大一部分就是源於這些新英格蘭揚基佬的清教精神。麥利和將福建比作美國的新英格蘭，將福建人比作美國的揚基佬。固然是相信福建能夠成為基督教新教在華擴展傳播的基點，同時也是對福建民間社會勤儉、精明、勇於開拓精神的一種肯定。

首先，麥利和介紹了福建地方的工農業生產。他說，「在

<sup>98</sup>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p. 153.

<sup>99</sup> 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頁39。

福建省，農民們一年內在同一塊土地上種植三批穀物。他們的耕作順序是，四月間播種稻米，耕種方式與美國農民種植甘藍、甜菜的辦法相似。到六月間，第二批穀物也播種在第一批穀物各排之間。這兩批穀物一起生長直至七月間第一批穀物被收割。之後，第二批穀物迅速生長，直到九月間的收穫。此時，土地被重新耕耘，以備十月初播種冬天的小麥。這季小麥生長到來年的四月初才能收成。然後，田地被用來種植夏季的稻穀。」<sup>100</sup> 麥利和認為，如今的農業生產仍然非常原始，「農具也較美國落後。」「作為一個階層，農民們既不富於資財，更無多少影響力。一般而言，他們愚昧無知，迷信偶像，勤懇節約，順服官長。他們也是我們所遇見的最誠實的人們……」<sup>101</sup> 1849年1月間麥利和與柯林雇船上游閩江。途徑閩清縣時，麥利和考查了當地的一家製糖工廠。他說：「我們途徑一大片甘蔗地。在閩清縣下行不久，我們來到一家正在開工的製糖作坊。這座榨糖廠房是簡易的木結構單層建築。層頂覆以茅草。作坊內有一台碾奪甘蔗的磨碾，一個糖汁收集甕罐，一個熬糖用的水壺。他們的磨碾與美國人釀製蘋果酒中榨壓蘋果汁的碾磨很相似。他們用小公牛拉動磨碾。儘管原理簡單，構造粗糙，這套機器看上去運行有效。……我們考查的工廠只生產粗糖；在福建省的其他地區尚有不少生產白糖、圓錐形糖塊、冰糖。」<sup>102</sup> 在明清兩代，製糖業一直是福建重要的糖的精細加工廠。

<sup>100</sup>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p. 23-24.

<sup>101</sup> Ibid.

<sup>102</sup> Ibid.

手工業部門。「史籍記載，福州『居民研汁煮糖，泛海鬻吳越間』。福州府屬的閩候、閩清、連江等地也都設有糖廠，從事製糖生產。其產品『都市遍鬻之』。」<sup>103</sup> 麥利和在閩清考查的製糖廠採用的是當時中國比較先進的磨蔗煮糖法。對於這一技術，明末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中亦有詳細的說明。在清末的福建，「當時糖的品種主要有烏糖（亦作青糖、赤糖）、漏斗糖（半白糖）、白糖和冰糖諸種」。<sup>104</sup> 麥利和在文中介紹的粗糖實際上就是烏糖。除了介紹福建的工農業生產，麥利和還多次深入福建內地鄉村城鎮，瞭解當地人民的生活狀況及風俗習慣，向西方社會披露了許多福建內地人民生活的真實情況。其中福建北鄰地區的蛇王崇拜現象尤其引起了麥利和的注意。崇蛇習俗是福建社會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現象。受閩地自然環境和生產條件的限制，閩人自古就對蛇王圖騰崇拜。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上解釋「閩」字本義時說，「閩，東南越，蛇種。」到清代末年，八閩各地都存在著蛇王崇拜的風俗。尤其是在山多林密的閩北地區，崇蛇之風更是極為盛行。麥利和是第一位詳細向西方社會介紹福建內地祭蛇儀式的外國人。1870年冬至1871年春間，麥利和與武林吉一同前往美以美會延平區巡迴傳道。途經南平市的樟湖板（chion-hu-Pwang）鎮，實地考查了當地的蛇王崇拜現象。樟湖板，曾稱為朱船板。明代《長溪瑣語》載：「水口以上有地名朱船板，有蛇王廟，廟內有蛇數百，夏

<sup>103</sup> 唐文基主編，《福建古代經濟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424-425。

<sup>104</sup> 同上註。

秋之間賽神一次，蛇之大者或纏人腰，或纏人出賽。」這是有關這一地區蛇崇拜的最早記錄。1872年4月，麥利和在《教務雜誌》上發表題為〈在華的蛇崇拜儀式〉一文，詳細介紹這一地區的蛇王崇拜。他說，「在鎮上有座規模宏大，裝飾精美供奉蛇王的神廟（蛇王廟）。在參觀這座城市的期間，我和武林吉到了這座神廟，……這座蛇廟在形制和裝飾上與中國普通的神廟並無二致。在蛇王廟的中心是一片開闊的庭院。庭院三面是供觀眾使用的遊廊。剩下的一面則是祭壇，在其中間有一座象徵蛇王的塑像，塑像約有兩尺半高，是一位男子持劍站立的形象。塑像的面目猙獰嚴厲，以示蛇王勇猛無畏及無窮的能量。塑像前面擺著焚香瓶，信徒就在此燃香禱告。」「每年的崇蛇儀式在七月三日，七月七日，七月十二日舉行。在這些天裏，人們排成長隊在鎮上的街道遊行。這一遊行最為奇特的就是許多崇拜者手中都握有一條蛇以示尊崇。在當地人看來，能在遊行中拿著一條蛇是件十分榮耀的事，而且節日期間遊行時拿的蛇越多就能為當地人民帶來更多的好運。因此，每年鎮當局都急於盡可能多捕捉大量的蛇類。看來，鎮上的居民心中的虔敬還不足以克服他們對已賦予人性色彩的蛇類的恐懼。」<sup>105</sup>此外，麥利和還介紹了當地崇蛇儀式的其他風俗，如，儀式中所用的蛇都是無毒的，遊行結束後，蛇被放回生息地，每位參加迎蛇遊行的人都可領到一塊糯米粢粑，偶爾被蛇咬傷的人都以王廟的烟灰敷用治療等等。應該說，麥利和對漳湖板鎮崇蛇民俗的

105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4 pp.307-308

106 參林國平、彭文字，《福建民間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記載是比較詳細的。在國內，對這一地區崇蛇民俗的研究調查到二十世紀才開始。<sup>106</sup>麥利和這篇文章不僅與這些研究互相印證，還可補充不少重要的歷史資料。

## 2. 福建地區的政治、軍事

麥利和在福建傳教的20餘年間，正值福建滿清政權的統治處於內外交困、風聲鶴唳的窘境中。福建的各級官僚機構政治腐敗，魚肉百姓。人民起義不斷爆發，大小戰鬥近百起，加之太平軍先後4次進入福建地區，局勢混亂不堪。麥利和與福建地方上層社會極少來往，所以他對福建官場政治、軍事形勢的認識多出自街談巷議以及自己的主觀臆測。儘管不夠客觀準確，卻比較真切地反映了福建民間群衆的不滿情緒。在麥利和這位傳教士看來，清季福建官場賄賂盛行，腐敗不堪，軍隊戰鬥力低下。1853年，永春縣的林俊、廈門的小刀會紛紛起義，反抗清政府。時任福建巡撫的王懿德稱，「上下游會匪陷漳州、海澄、漳浦、同安、廈門、安溪、永安、石碼、平和、詔安、尤溪、沙縣、大田、德化、永春、仙遊。台灣賊掠台灣鳳山嘉義。全閩騷動。」<sup>107</sup>這些起義直到1855年才漸次為清軍剿滅。王懿德批評清軍時說，「總覺積疲成習，振作為難。今年四月軍興以來，徵調繁縝。而各營將領，非稱無兵可調，即所謂之兵，亦多怯懦不能習戰。」<sup>108</sup>

麥利和的著述自然不會放過嘲笑清軍無能的描述：

107 王家勤，《王懿德年譜》（上卷），頁45。

108 同上註，頁61。

1854年夏，福建西部受到叛亂份子的襲擾，這些反叛者藉著太平軍運動的聲勢，搶掠財物，破壞農莊。為鎮壓當地的叛賊，總督臨時派遣了多隊兵勇前往鎮壓。這些兵勇經過短暫的戰鬥後總是報捷而歸。有一次，總督徵調不少家住我們小教堂附近的兵勇。我饒有興致地看著他們穿上軍裝，告別家人和鄰舍，開赴危險的戰場。他們走了近2個月。一天，我正結束佈舍，突然消息傳來，兵勇們回來了。所有人都擁上街道的活動，突然消息傳來，兵勇們回來了。所有人都擁上街區看熱鬧。當這支衣衫不整的軍隊沿街前行時，我注意到我所有的鄰居全都安全回家。我驚訝地問，「什麼！你們全都平安反回嗎？」他們回答道，「是的，只有兩、三個傢伙吃太多水果患痢疾而死。」我接著問「那戰鬥的情形怎樣？」「嗯，我們有時處在戰爭的危險中。」我說「什麼！你們沒有找到敵人嗎？」「找到敵人」他們略為認真地說，「我們經歷了約50場激烈的戰鬥！」我吃驚地說，「50場戰鬥卻沒有一個傷亡。」「傷亡！」他們憤慨地回答「唉！你來看看這個！」他們掀開破爛的衣服，被荊棘劃傷的皮膚述說著他們的悲傷與戰事的荒謬。看來，他們的訴說會沒完沒了。我只得中斷了這個話題。<sup>109</sup>

此外麥利和著力揭露了清末福建政治的黑暗腐敗、官場上下互相欺瞞。為此，麥利和特別以1853年福建當局處置興化烏白旗械鬥的事件為例<sup>110</sup>，「在福建福州以南約五十英里的興

<sup>109</sup>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pp.32-33.

<sup>110</sup> 關於興化烏白旗的械鬥事件，莆田鄉紳陳池養在《慎余書屋文集》(卷2)載：「道光二十五年，仙邑、香蓮、慈三裏聯鄉大鬥，旗分黑白，因有烏白旗之名。」雙方「各分黨類，日事戰鬥，芟除樹木，毀壞禾稼……攔阻

化府，人們分為烏旗、白旗兩派，多年來兩派之間糾紛不斷。他們之間頻繁的衝突使這個府處在長期的騷亂和不安之中。在當地，農作物無法及時收穫，商業活動不時中斷，行旅的安全亦時常受到騷擾。政府不斷試圖解決這一難題，但毫無效果。事實上，政府派往彈壓的軍隊常常促成兩派的暫時聯合以對抗共同的敵人——政府軍。1850年到1853年期間，兩派看來又陷入不斷的械鬥中。一切都處在混亂之中，當地的政府完全喪失了控制局勢的能力。在這節骨眼上，本省的巡撫（王懿德）徵調一支軍隊，開往叛亂的地區。這支軍隊經過約四個月的戰鬥，凱旋而歸。他們宣稱，交戰的烏白旗民衆已完全平息。但不久，人們便紛紛傳言，近來官軍勝利是靠不光彩的手段取得的；簡而言之，械鬥的雙方，賄賂巡撫請其撤回軍隊，而巡撫則向皇帝呈上一份關於全部問題已圓滿解決的虛假而生動的戰報。一位紳士瞭解到這問題的全部真相後，向朝廷奏報了這一情況。皇帝立即派遣了一名欽差前來調查此事。欽差一到達福州，馬上受到巡撫的款待，巡撫還四下張羅佈置，使欽差的調查完全處在他的控制之下。接著，巡撫用賄金威逼利誘奏報者寫下自供狀，自供狀上稱他本人在上奏中對巡撫的指控完全是虛假的，而這位巡撫則是位最正直、最高尚的官員；他在奏章

舟輶行旅。」1853年，林俊起義，聯合烏白旗之力攻打郡城。由於烏白旗人多勢衆，官軍無力剿辦，一度試圖以招撫了事。時人魏秀仁在《院南山館詩話》(卷8)載，「某協戎督師剿辦，不能剿一匪鄉，梟一匪首……在事文武，恤於往事，一以和解為主，仍是辦理械鬥故習。甚至王春波中丞泉州凱還，自塗嶺以迄興化，令前驅以銀牌及六品軍牌分給旗匪，民間因有『買路』之謠」。麥利和的記載當是緣此則發。

中列舉的那些惡毒的謠言完全沒有根據。因此，他現在伏請皇帝從重治罪。說也奇怪，這份所謂自供狀的內容居然充分反映在欽差呈給皇帝的報告上。朝廷迅速降旨免去有關這位巡撫的指控，而那位奏疏的作者則被判充軍北方邊境！」<sup>111</sup>

### 3. 晚清的福州城市社會

鑑於居住地點與活動範圍的限制，麥利和對福建最熟悉的當屬福州的城市生活。他的著述詳細地向後人展示了清季福州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他的筆下：「福州是福建省的首府，是中國一流的城市，城市人口約為六十萬。……這座城市是帝國最堅固的軍事要塞之一，它的居民以文學造詣和商業活動聞名全國，……福州是中國省會，城市在花崗岩地基之下用磚砌成的城牆。城牆約有 20 英尺高，10 英尺厚，城牆每隔一段距離就有一座五英尺高的堡壘。城門規範巨大構造堅固。一支小規模的軍隊就可抵禦任何武裝力量的進攻。」

#### 一、城市佈局與公共建築

「這座城市是按照一定的規畫佈局的。城中的許多街道彼此平行或呈直角交叉。城市的主要街道稱為南街。這條街道從南門直到北門，將這市區分為兩塊面積幾乎相同的地區。南街道路乾淨，街面寬敞（以中國的標準），是全城最繁華的商業街區。市區最好的店鋪都在這條街上，它們的經營業績優良。這座城市西區的大部分居民是致仕的官員以及其他有錢有勢的人家。西區的一些宅第的設計體現主人的生活品味和藝術氣質。

111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pp.83-84.

南街以東約占城內八分之一面積的地區是韃靼人的社區。八旗駐軍就屯駐於此。這些旗人軍隊由政府出錢豢養，嚴禁與漢人通商或通婚。他們通常過著閒適倦怠的生活。這些旗人可悲地染上了吸食鴉片等惡習。他們的生活狀況正好應驗了一句古老的諺語，『一個懶散人的頭腦是邪惡滋生的溫床。』刑場設在北門外，而軍隊的校場則緊挨著南門。」<sup>112</sup>

「在福州，城外的人口數與城內的人口大致相同，這些人口聚集在城門外，構成了大規模的近郊社區。在這些近郊社區中，從南門延伸至江濱的『南台』是最大、最重要的一塊社區……南台是福州內外商貿的中心區。這一區域的景象是令人難以忘懷的。綿延六英里的街區旁，商店與住宅鱗次櫛比。市面上熙熙攘攘，人語喧嘩。外國人士的商行和住所集中在緊挨著閩江的一帶地區。在閩江的南岸，面對著福州城區的地方是塊秀麗的高地。外國人士已經成功地在此購得大塊的土地，用於修建他們個人的住房和辦事處。」<sup>113</sup>

此外，麥利和對福州城市內外的公共建築如塔廟、科場，也作了專門的介紹。他指出「這座城市內外遍佈著寺觀廟宇。在城內，著名的廟宇有孔廟、帝廟、道山觀、城隍廟以及烏石山、烏山上的兩處廟宇。孔廟是座規制壯美的建築，大約八年前（1854 年；咸豐五年），政府將其修繕一新。相形之下其他大部分廟宇建築則顯得骯髒、陰暗，甚至出現塌毀的現象。在

112 Ibid., pp.145-153.

113 Ibid.

城外，距外國居住區不遠的閩江南岸郊區，有座外國人士稱為『寧波祠』的廟宇。這是座亮麗堂皇的建築，供奉著庇護水手的女神（應指臨水夫人陳靖姑——作者註）。福州人民對她的崇拜熱情遠遠超過任何其他廟宇。此外，城內的南門附近亦有兩座高塔。每座塔九層，一座稱為『白塔』，一座稱為『烏石塔』。他們分屬兩座佛寺。這兩座佛塔都十分破舊，特別是白塔，由於損壞嚴重，已禁止任何人登塔。」<sup>114</sup>

## 二、民風民俗及對外商貿：

麥利和介紹福州社會的民風民俗時，認為「大體上講，福州民衆的性格富有朝氣，堅忍不拔。他們特立獨行，喜好演講。不過這些演講經常會變成粗野無禮的相互謾罵。他們這些舉止不只針對外國人，就是他們彼此之間也時常是如此粗野無禮。與中國其他地區相比，福州人民顯得更為粗獷，更為直率，富有男子漢氣概。他們不太狡詐，奴性較少，也不喜歡溜鬚拍馬。這座市民衆的傲慢態度是顯而易見的。這種傲慢態度很可能與這樣兩個事實有關，一是他們從來未曾體會到外國軍事力量的強大影響；一是他們體質上的多血質特性。」<sup>115</sup>

在福州，「蟹戶們構成了一個龐大而有趣的社會階層。閩江大橋上下游兩岸的淺灘上，四處是優良的停靠碼頭。由各式各樣小船組成的船隊擠滿了碼頭江面。較大的船隻主要用於運送來往於福州與內地之間的商貨，或裝卸轉運駛到閩江口鹽船、米船上的貨物。而較小的船隻則用於擺渡和垂釣。遠洋航

114 Ibid.

115 Ibid.

運帆船碼頭位於大橋的下游。這個碼頭時常擠滿了遠航的平底帆船。福州商貿流動的貨物有茶葉、木材、稻米、鹽、糖、樟腦、紙品、海帶、木炭以及其他商品。」<sup>116</sup>

福州是清末最早對外開埠通商的沿海口岸。麥利和在福建活動期間，正是福州開埠通商的最初階段。那麼。開埠初期的福州對外商貿情形如何呢？麥利和的記述是，「在 1842 年—1843 年，中英即將達成《南京條約》之前的談判中，中國官員極為反對將福州劃入對外開放的口岸之列。只是因為英國特命全權大使強力地堅持才得落實該項條款。但此後福州地方當局的政策表明，只要有可能，他們一定會阻止福州對外貿易的發展。開埠的最初近十年內，他們這項政策幾乎獲得圓滿的成功。到了 1853 年，帝國南方各省的叛軍活動切斷了帝國政府在廣東海關的茶稅來源，福州地方當局遂採取措施開放此地的對外貿易。福州地近紅茶產區，外國商人能在此以比中國其他口岸更低的價格購買到他想要的茶葉。他們能夠在每一茶季開始之時就將新茶運到倫敦、紐約及世界其他地方。而這一速度要比中國其他口岸新茶發運的時間快一個月。」<sup>117</sup>

116 Ibid

117 Ibid